

黄新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台湾 教育： 从日据到光复

黄新宪 著

台湾 教育· 从日据到光复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黄新宪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1002-1

I. ①台… II. ①黄… III. ①教育史-研究-台湾省
IV. ①G5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576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

黄新宪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5 字数 337,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002-1/G · 1552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

第一章 伊泽修二与日据时期教育的发端	3
第二章 “皇民化”运动与“皇民化”教育	18
第三章 书房教育的演变	41
第四章 公学校论	59
第五章 小学校研究	73
第六章 女子教育探讨	85
第七章 台北帝国大学论略	114
第八章 职业教育的嬗变	132
第九章 少数民族教育论	145
第十章 籍民教育探微	156
第十一章 音乐教育的若干问题	170
第十二章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	182
第十三章 图画教育的发展	205
第十四章 台湾学生留学日本考	218
第十五章 台湾学生求学大陆考	250
第十六章 台湾学生在大陆的爱国活动	262

第二编 光复后的台湾教育

第十七章 学人与光复初期台湾教育事业的推进	275
第十八章 光复后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	289
后记	310

第一编

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

第一章 伊泽修二与日据时期教育的发端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日本占领。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日本在实行严酷管制的同时,还开展了所谓“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运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构建日据时期教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促成台湾日据时期教育发端的一个重要人物,与这一时期的台湾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日据台湾 50 年的教育史,不能不提及伊泽修二。

伊泽修二(1851—1917 年),日本长野县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先是跟随外祖父内田文右卫门读书识字,后进入藩学读书。这一时期,日本正处在脱亚入欧的进程中,伊泽修二受到影响,在钻研汉文书籍之余,也潜心于西学的学习。从 1867 年开始,伊泽修二辗转于江户、京都之间,从事英文字典的翻译。为了提高英文水准,他还随当时在东京的美国传教士李尔学习英语。此后,在东京的第一番中学及日本文部省任职。1875 年 3 月,被委任为爱知县师范学校校长。1876 年 7 月,奉派赴美国考察师范教育,并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师范学校,随美国学者贝尔学习“视话法”,这为他后来从事聋哑教育和口吃矫正打下基础。一年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理学。1878 年 5 月,伊泽修二结束在美国的学习返回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是任代校长,后升任校长。任期内,对师范教育进行了改革。1881 年 6 月,他再次进入日本文部省任职,先后任少书记官、大书记官、编辑局次长、编辑局局长,对小学校教科书进行了大的改革。自 1887 年 1 月起,他兼任新创办的东京音乐学校校长和东京盲哑学校校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由囫圇吞枣的全盘西化到极端的国粹保存主义的论争。这一文化论战反映在教育思想上,便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①作为日本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伊泽修二也介入了这场争论。1890 年 5 月,他发起创立“国家教育社”,鼓吹忠君爱国思想,主张发扬国家主义式的

① 洪惟仁:《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台湾风物》第 42 卷第 3 期,1992 年 9 月印行。

教育观念,以国家力量推动教育事业。这一思想与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其实质在于“是以死忠于天皇为前提之条件,殊少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之灌输。自难合乎现代民主国家之生活要求或意识培养”^①。同年6月,创办《国家教育》杂志。此后,创立了一系列的教育团体。如1892年创立国立教育期成同盟会,大力呼吁应由国库负担普通教育经费;1892年6月,创立学制研究会,致力于学制改革。显然,伊泽修二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教育经历和较高教育素养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日本现行教育政策的极力拥护者和实践者,他从事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体。作为一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日后在台湾从事日据时期教育的真实用意也与此相关。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结束,台湾割让给日本已成定局,日本政府内定桦山资纪为首任台湾总督。为了在台湾这一特定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教育理想,伊泽修二以国家教育社代表的身份,赶往广岛,晋见正在那儿筹划接管台湾的桦山资纪。伊泽修二向桦山资纪强调,占领台湾“可说是我方以数千武夫流血下,使得以归顺的结果。但是,要把台湾岛民自心底归顺日本,用武力及武夫是不能做到的。而且必须要应用教育的方式,以刻苦、仁爱、容忍、耕耘、牺牲奉献的精神,才能见其实效,而非以武夫手腕和压迫方式推展。”^②除阐明对台湾教育的建议与抱负外,他还希望台湾能成为“国家教育”的实验场。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在台湾推行“国语”(日语)的教育政策,达成将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的目标。同时,出示了自己设计的用假名符号注音的官话歌书《日清字音鉴》,认为此书对于日后台湾人的教育将大有益处。后来,他回忆道:“台湾将成为我国领土是一项公开的秘密,而且对当时新领土台湾将任命桦山为首任总督之事也略有所闻,所以我受牧野文部次官之引介,到大本营拜访桦山大将,听取他对台湾教育的意见,对在台湾实施国家主义教育,也提供了其个人的看法。”^③伊泽修二关于台湾教育的一些基本主张与桦山资纪治理台湾的理念相吻合,于是当即邀请他前往台湾主持教育。不久,伊泽修二出任台湾总督府代理学务部长,负责具体规划和实施日据时期教育。

1895年6月17日,伊泽修二抵达战火未熄的台北,随同他一起来的有樺取道明等六位日籍教师。伊泽修二率这些教师在台北士林芝山岩的惠济宫设立了

① 刘宁颜:《重修台湾省通志·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第218页。

② 杨孟哲:《日治时代台湾美术教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③ 同上,第29页。

“芝山岩学堂”，并在当地聘请了吧连德、林瑞庭担任助理，开始教授日语。同时，将学部也迁至芝山岩。创校伊始，由于台湾人民对占领者存有深深的敌意，要开展正常的教育，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为此，伊泽修二约见台湾的一些知名士绅，表示“希望你们成为日本的良民，是必须接受教育，我们是为了岛民之教育而来，因此希望你们将子弟带到此地来学习寄读，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对你们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①。即便做了工作，初期只有五六位家长送子弟前来就读。除了人数少之外，外部环境也十分动荡，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仍在继续，侵略者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正在学校周边展开。“在炮火轰炸下，开始实施新教育，岛民受教育之处仅离战火不远，大炮声响惊动整个教室，燃烧村落，近在咫尺。”^②芝山岩学堂最初仅招收 21 名台湾学生（日语练习生）。其中，甲组学生 6 人，最早入学，略解日语；乙组学生 8 人，年龄较大，于汉文有一定素养，准备出任官吏及教师；丙组学生 7 人，最后入学，年纪尚幼，于汉文无根基。甲组有柯秋洁、潘光赭、潘光明、潘光楷等，乙组有朱俊英、叶寿松、邱龙国、张经、张柏堂、郭廷献、吴明德、刘铭臣等，丙组有林隆寿、施锡文、施锡为、柯秋金、柯秋江、吴文明、施锡辉等。使用的教材有《日本语教授书》、《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详解》等。这些学生日后成了台湾总督府和台湾人之间的沟通媒介，如柯秋洁、朱俊英、叶寿松、张伯堂等出任总督府讲习员的台湾语讲师；施锡文为日本判任官的通译；吴文明任医师；邱龙国帮助编成《日台小字典》。芝山岩学堂被认为是“日据时代台湾最初的教育机关，总督府所谓的‘全台教育发祥地’，也是台湾国民教育的滥觞”^③。

当伊泽修二在芝山岩学堂进行了约 3 个月的日语速成教育后，日军镇压了台湾南部的起义军，并占领了台南。10 月 25 日，伊泽修二随桦山资纪前往台南进行所谓宣谕民众的活动。在此期间，会见了正在当地的英国传教士巴克礼牧师。巴克礼已在台湾呆了 12 年，创办了中学、幼稚园、小学校及神学院。据伊泽修二回忆：“我为了讨教而访问巴克礼，巴克礼以为我是奸细不肯见，我说：‘绝无此事，我完全是为了教育问题讨教来的，我听说先生十二年间从事当地教育，想来听听您的意见。’巴克礼乃欣然接见。巴克礼说：‘那么请您说说看怎么教育。’我说：‘台湾既归我领土，我拟用日本语教育。’他说：‘这是错的。’他的理由是说，当初他们也以英语教育，花了二、三年时间好不容易训练出宣教师来，不料都走

① 杨孟哲：《日治时代台湾美术教育》，第 31 页。

② 同上，第 32 页。

③ 汤志民：《台湾的学校建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32 页。

了,搞茶的代理商去了,或者搞通译去了,可见用英语搞教育有害无益。要以日语教导台湾人民最不可行。‘照我的经验,我以为不可行。一定要用台湾话来教育。你们既然说要教育人民,那就应该用台湾话,不能用日本话。’我说:‘谢谢您的经验,我有信心可以用日本话。来日再向您请教。’就此分别。”^①这段对话表明了两人在如何开展台湾教育方面的分歧,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教育目标有不同的看法。“伊泽不但是当时日本国家教育社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日本教育界的顶尖人物。在他的教育方针中,将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乃是最重要的统治目标,教育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手段罢了。所以从台湾教育一创始,伊泽即已考虑以推行日语教育为教育政策的最高原则。”^②此后,伊泽修二并没有因为巴克礼的劝说而改变主意,他坚持按既定的目标从事教育活动。

赴台前,伊泽修二认为台湾人必然懂得中国的官话。不料,到台湾后才发现,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并不完全懂得中国的官话,这使得随其而来的 100 余名为日本占领军从事官话通译的人员无用武之处。由此,他意识到在台湾办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应从语言的学习入手。“凡得国者须得民,而得民须得民心,欲得民心,非假沟通彼此思想的语言工具之力不可。台湾位居中国南陲,其方言迥异于华北,即是熟谙官话的翻译官,亦几无用武之地,此证之于过去军队的经验,已甚清楚,然今之内地人(日人)懂土语(闽南语)者甚少,而土人(台人)中则几无懂国语者,在此情况之下,欲推行治民之术,开启教化之途,实颇困难……。”^③在他看来,日语传习是引导台湾人成为了解日本文化的一分子,进而成为认同日本、传播日本文化的顺民的重要途径,日语应取代清朝官话成为台湾人的“国语”。为此,他十分注重所谓的“国语教育”。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台实施殖民地语言政策,统治初期即以‘同化应自语言开始’的观念,采半强制方式实施日语普及政策。当日本官员在 1895 年 7 月中旬抵台湾时,日语还只是被称作‘日本语’,但在短短一年内,日语便正式称为‘国语’。日本统治者为了使台湾人接受日语,涵养日本文化,乃于占领台湾的第二年,公布设立‘国(日)语学校’及‘国(日)语传习所’,作为推展日语的教育机关,并由此发展出制度化的学制,逐步渐进地加强日语普及设施与活动,形成了近现代台湾社会语言学上的重要历史事件。”^④作

① 洪惟仁:《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台湾风物》第 42 卷第 3 期,1992 年 9 月印行。

② 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9 页。

③ 陈恒嘉:《以“国语学校”为场域看日治时期的语言政策》,见黎中光等:《台湾近百年史论集》,台北吴三连基金会 1996 年印行,第 15 页。

④ 邱敏捷:《论日治时期台湾语言政策》,《台湾风物》第 48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印行。

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策划者和亲历者,伊泽修二将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课分为教务课、编纂课,初级教育设“国语”传习所,中等教育设“国语”学校。“国语”学校分师范部与语学部,师范部以培养初等教育师资为目的,语学部分土语科与“国语”科,以培养初级官吏等。“国语”科招收台湾学生,教授日本語;土语科及师范科招收日本学生,教授台湾语。设立之初,通过各地士绅、总理、总代、街庄长等地方有力人士协助劝募学生,全免学费,以鼓励台湾人子弟入学。日本人控制的舆论工具对这些新设立的教育机构极尽宣传鼓吹之能事,如《台湾新报》经常在汉文版上报导各地“国语”传习所创办并开展活动的消息,强调当地士绅踊跃参与教育事务并送子弟入学,指称各地居民纷纷请求增设分教场等等。然而,由于社会上仍通用汉文,修习日语对日常生活没有帮助,加以对日本人有种种的疑虑,因而,初期台湾人的子女大多仍进传统书房修习汉文,“国语”传习所不易招到学生,缺席及中途退学者甚多。由于难以与书房相竞争,甚而发生当总督府官员视察之际临时借用书房学生以凑足人数之笑谈。但是,随着日本统治地位的逐步稳固,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仅当年便设 14 所“国语”传习所,第二年再设 2 所,共计 16 所。“国语”传习所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甲科生,学习的科目有“国语”(日语)、读书、作文等,修业时间为 6 个月,然后担任街、庄、保等基层组织的吏员,或在私塾传授日语。另一类为乙科生,学习学科有“国语”(日语)、读书、作文、习字、算术,以及地理、历史、唱歌、体操等,修业时间为 4 年。毕业后在公私机构从事业务工作,或进入高一级学校就读。

设立“国语”传习所,以便在语言层面上负起“教育”台湾人之责任,这是以伊泽修二为首的学务部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的迅速施行,使得招聘大批日语讲习员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伊泽修二于 1895 年 10 月底返回东京招收讲习员。次年 2 月 12 日,他在文部省修文馆内设置了一个临时机构,开始招生工作。招生办法由文部省统一制定,并由该省的参事寺田勇吉负责将之发送到各府县。东京的考生在文部省接受笔试,各府县的考生则在当地的郡公所接受笔试,合格者统一集中到东京接受语音测试。接着,举行了第二次笔试及语音测试。3 月 24 日,从中录取了 45 名。4 月 6 日,伊泽修二带领学务部的有关工作人员以及这些讲习员学生,由日本宇品港出发,于 4 月 11 日抵达台北。4 月 13 日,全体人员到达芝山岩学堂,并于 4 月 15 日开始上课。课程内容为台湾方言、日语教授法、中国式公文、体操、歌唱、博物学以及卫生学等。后来,由于设置了“国语”学校,这些讲习员同时也进入“国语”学校,成为第一届讲习员。在对这些人进行岗前培训时,伊泽修二指出:“台湾话能力不足,是我最担心的事,但台湾人及我

国国民在意志上能相通,感情相融洽,要尽可能使用台湾语。万一得不到要领时,即使有语言障碍时,也必须用汉文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①1908年10月,伊泽修二应台湾教育会的邀请,返回台湾参加“台湾铁道全通典礼”,并发表了“对台湾教育的今昔之感”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忆了当时的教学情景: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教这些学员会话,而是要求他们单就台湾十五音中的字音做八声的练习。这些学员从早到晚地练个不停,台湾的八声刚进入耳里时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练习的难度很大。等到分辨得出这八声,就耗去了三周的时间,约占60个讲习日的三分之一。其后的40天,才开始教他们日后课堂教学中最需要的会话。学员中的加藤元右卫门结业后长期在台湾从事初等教育工作,他在《芝山岩怀旧录》一文中,对当时的讲习情形也有详尽的描述:“讲习以台湾语为主,教师是前年在该学堂接受日本语传习的柯秋洁、陈兆鸾、朱俊英、叶寿松、张柏堂等五氏,首先由八声入手,渐次进到会话,最后,也学习了简单的翻译……讲习期间,伊泽先生每亲临教场,对讲习严加督策,对教师的教学若有不妥之处,必予指正,有不满之点则必大声叱责,学务部员、教师、讲习员无不敬畏有加,最后,大家背地里都叫他‘雷公’……。”^②这篇文章还对芝山岩学堂的设备、生活等内容也进行了介绍。从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这所学校不像日后的“国语”学校那样,以“学校规则”的形式规定了授课时数、教科程度等课程标准,但是,其具有“应急”、“密集”的性质,学员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讲台湾方言。后来伊泽修二认为,这批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习得了“台湾语之大要”的日籍讲习员,对其后台湾“教育之隆盛”功莫大焉。^③

第一届讲习员学习班教师名录^④

学务 部长	校长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台湾 讲师	台湾 讲师	台湾 讲师	台湾 讲师	台湾 讲师
伊泽修二	町田则文	吉沢俊明	小田深三	栗野传之亟	上野道之介	大久保孝之助	须田小五郎	木原刚	柯秋洁	朱俊英	叶寿松	陈兆鸾	张柏堂

① 杨孟哲:《日治时代台湾美术教育》,第35页。

②③ 陈恒嘉:《以“国语学校”为场域看日治时期的语言政策》,见黎中光等:《台湾近百年史论集》,台北吴三连基金会1996年印行,第20页。

④ 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4页。

第一届讲习员学习班学员名录^①

府县	东京府	鹿儿岛县	京都府	福冈县	富山县	福井县	大分县	茨城县	岩手县	高知县	东京府	京都府	熊本县	鹿岛县	山口县	富山县	三重县	新潟县	爱媛县	东京府	青森县	爱媛县	长野县
姓名	三屋大五郎	壹岐休太郎	高木平太郎	堤贞廉	前田孟雄	浅井政次郎	蓝原新三	中山重次	仁田驹次郎	松本恒德	益田精次郎	坂根十二郎	岛村和四郎	早间恒	井上武之辅	津田政二郎	须田襄	堀正次郎	赤松三代吉	菅野赫次	花田大六	渡连高市	山口吉治
府县	静冈县	福岛县	群馬县	福冈县	长野县	冈山县	东京府	青森县	三重县	滋贺县	东京府	埼玉县	茨城县	爱知县	宫城县	爱知县	埼玉县	埼玉县	东京府	东京府	山口县	静冈县	
姓名	增田龙作	小菅松内	滋贺邦次郎	林元三郎	大岛丑三郎	多罗尾光利	笠井源作	齐藤典治	丸山德三	中堂谦吉	富冈僚太郎	宫本一学	铃形悌三郎	芝山丰平	相泽源太夫	新家鹤七郎	加藤元右卫门	伊原太郎	户仓广雅	加贺美五郎七	美和元一	富田仙太郎	

这些讲习员中,来自东京县府的7人,埼玉县3人,京都、福冈、富山、茨城、静冈、长野、青森、三重、山口、爱媛、爱知等府县各2人,鹿儿岛、福井、大分、岩手、高知、福岛、群馬、冈山、滋贺、熊本、广岛、新潟、宫城等各1人。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后,迅即在台湾开展语言推广工作。

第一届讲习员毕业后,伊泽修二再次前往东京进行第二届讲习员的招生工作。他发文给各府县知事,并举办考生的语音测试和笔试,录取甲种讲习员50名、乙种讲习员26名。1896年12月15日,他带领这批讲习员学生抵达台湾。甲种学生在芝山岩学堂学习,乙种学生则借用大龙峒第三附属学校上课。1897年4月1日,在淡水馆举行了第二届讲习员毕业典礼,毕业生计有甲种学生49人、乙种学生22人。伊泽修二陪同台湾总督乃木出席了毕业典礼。甲种讲习员主要从事教职工作,乙种讲习员主要担任吏员工作。

这类讲习班总共举办过7届,先后毕业的学生人数达264名,多数学生被分发到各地的“国语”传习所和公学校,成为日据时期从事教育的骨干。严格来说,伊泽修二负责教育的只是前二届的学生,当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已是1901年3月,此时伊泽修二早已离开台湾返回日本。但是,他所起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有台湾学者将伊泽修二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这一工作视为单纯

^① 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4页。

的语言推广工作,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第一,这是最初的闽南语教学,这一阶段的摸索和试验,奠定了其后闽南语在正式学校里的教学模式。第二,这一教学活动所使用的教材,是受到新式教育训练的人,以新的观念、新的技巧所编出来的,不但对传统的十五音做了较为科学的整理,并且以日本的片假名为张本,给闽南语设计了一套对学习的日本人来说可以说是十分完备、好用的“闽南语假名音标”,这是继十五音、教会罗马字之外,给闽南语留下重大影响和庞大资料的发明。闽南语音标,可以说在这时候得到了空前的、唯一的一次由官方主导的“统一”。第三,这 264 人看来虽少,但是由于他们在日本国内都是师范毕业有教学经验的热情、有理想的现职教师,结业后,也都派出去做学校的主管,或在教学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264 人中,就有不少后来成为日本有名的、有分量的学者。^①笔者认为,不论这项活动在技术层面上如何详尽细致,但掩盖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主办者的主观愿望在于通过让来自日本的讲习员掌握台湾方言,进而使之更好地进行日语的传授,来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这就赋予了这项活动十分鲜明的指向性,即直接为日本的统治服务。

第二届讲习员学习班学员(乙种)名录^②

府县	茨城县	熊本县	广岛县	爱知县	滋贺县	冲绳县	山口县	长野县	爱媛县	兵库县	群馬县		静冈县
姓名	饭村定之助	桥本胜伸	种野尚三郎	中川文日立	野村宰	冈田由造	来原庆助	山崎金作	福本龟雄	坂本官治	松山秀	岩山义昌	家永龟太郎
府县	岐阜县	岐阜县	三重县	大阪府	石川县	山形县	神奈川县	东京府	福岛县	滋贺县	鸟取县	佐贺县	山口县
姓名	林久松	若山忠次郎	中西弘满	长尾贞吉	大井恒吉	小关惣次郎	山田止通	马渊维雄	佐藤信义	平塚廉	小田秀太郎	池田次郎	吉冈小太郎

^① 陈恒嘉:《以“国语学校”为场域看日治时期的语言政策》,见黎中光等:《台湾近百年史论集》,台北吴三连基金会 1996 年印行,第 19 页。

^② 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35 页。

第二届讲习员学习班学员(甲种)名录^①

鹿儿岛县	黑葛原藤太郎	群馬县	泷野弥市
东京府	松浦尚次郎	熊本县	岩边知言
京都县	小岛助道	福井县	永田稻作
山形县	加藤忠太郎	滋贺县	大谷甚吉
宫崎县	儿玉虎袈婆	长野县	牛尾格
冈山县	平井又八	山梨县	中山翠
岛根县	三成松太郎	茨城县	饭岛清四郎
山形县	金野寿作	爱知县	伊庭广告
埼玉县	平田忠四郎	茨城县	松叶千之助
山口县	藤井繁次郎	石川县	新保全平
高知县	杉房之助	石川县	长谷八太郎
高知县	竹村羊太郎	佐贺县	江口保
茨城县	金子政吉	山形县	我孙子藤太
长野县	林贤次郎	冲绳县	翁长林芳
茨城县	杉田觉次郎	高知县	内海虎三
静冈县	铃木釜次郎	福冈县	中村浩
熊本县	福岛龟太郎	鹿儿岛县	鹿岛修正
乌取县	笠间秀雄	石川县	山口喜一郎
滋贺县	森武三		
青森县	对马辨五郎	佐贺县	牟田袈婆市
茨城县	高波见幸之助	和歌山县	石井乙之助
茨城县	绵引久太郎	鹿儿岛县	正示达
茨城县	山崎准绳	广岛县	牟田袈婆市
乌取县	冈本幸二	山形县	山口喜一郎
茨城县	上条邦太郎	宫崎县	鹿岛修正
府县	姓名	府县	姓名

1896年4月1日,日据当局鼓吹废军政行民政,并宣布台湾教育事业结束了第一阶段“目下急要之教育”的日语传习所时代,开始实施所谓的“永远的教育事业”。在伊泽修二的主持下,芝山岩时代教务、编纂不分,初级教育、中级教育混合的做法得到改变。自上年起开始教授日语的芝山岩学堂,被改组为“国语学校”。同时,重新创建了“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由培养日本人与台湾人译员等官吏的语学部,和把从本国招募来的日本人培养成国语传习所教员的师范部构成”。“国语传习所分作两个科别:一是以十五岁以上成年人为对象,迅速培养译员等底甲科;一是以十五岁以下青少年为对象施行以日语为中心底初等教育之乙科。”由此可见,“在用军队进行武力压制的同时,冠上‘国语’字眼的两个教育机关也急不可待地登上了统治台湾的前沿阵地。”^②在伊泽修二的努力下,1896年3月3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了“直辖学校官制”。依照这个官制,在日本招收的第一届讲习员及芝山岩学堂的学生分别成为“国语”学校及附属学校的学生。5月21日,公布“国语”学校及附属学校的名称、位置如下: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设在台北,第一附属学校设在八芝兰,第二附属学校设在艋舺,第三附属学校设在大稻埕。6月1日,芝山岩学堂又改称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一

① 李国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6页。

②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附属学校,12月25日,在台北城南门街新建校舍,并于翌年9月11日完工。仅在1896年9月,在伊泽修二的筹划下,在台南、凤山、恒春、嘉义、淡水、鹿港、澎湖、云林、苗栗、基隆等地设立了“国语”传习所。进入1897年,作为台湾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伊泽修二为构建日据时期教育体系又采取了许多具体的举措。如批准云林“国语”传习所迁移以及分校之设置;举行第二届讲习员毕业证书授予仪式;录取“国语”学校师范部学生30名、语学部学生35名;增设埔里台东“国语”传习所;师范部、语学部开始授课;在台北医院设置医学讲习所;将鹿港“国语”传习所迁移彰化并改称彰化“国语”传习所;批准内埔分教场之设立;批准台东“国语”传习所马兰社、卑南社分教场之设立;开设第一附属学校女子部,招收新生48名;发布“国语”学校第四附属学校规程;修正“国语”学校规则;录取“国语”科学生24名;公布“国语”学校官制;公布“国语”传习所官制。

伊泽修二十分注重国语学校及师范学校的设立。在他看来,“国语”学校应是培育日本籍教员和各级官吏的机构,师范学校则是以培育台湾籍教员为目的之机构。在他的设计下,总督府“国语”学校由师范部、语学部、“国语”学校附属学校、“国语”学校附属小学等分支机构组成。其中,师范部主要培育“国语”传习所、师范学校之教员及小学校长,学习科目有修身、教育、“国语”(日语)、汉文、地方语、地理、历史、数学、簿记、理科、唱歌、体操,修业时间为2年。语学部又分“国语”学科和地方语学科。“国语”学科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台湾青少年掌握日语,以便将来任职于台湾之公私机构,从事业务工作,如担任翻译、基层官吏、业务人员等。学习的科目有修身、读书、“国语”(日语)、作文、习字、算术、簿记、理科、歌唱、体操等,修业时间为3年。地方语学科主要学习修身、读书、地方语、作文、习字、算术、簿记、地理、历史、唱歌、体操等科目,修业时间3年,毕业后在公私机构担任翻译、基层官吏、专业人员等。“国语”学校附属学校主要为普通教育提供良好的示范,并为师范部学生提供教学演练场所。学习的科目有修身、“国语”(日语)、读书、作文、习字、算术、唱歌、体操等,其中幼年生年龄在8岁以上15岁以下,修业年限为第一附属学校6年,其他相关的2所学校为4年,毕业后将在公私机构从事业务工作,或进入高一级学校就读。青年生年龄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修业时间为2年,毕业后担任街、庄之吏员,以及翻译、学校行政人员,或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国语”学校附属小学为完整之小学教育与实用夜校提供示范,修业时间为8个月,毕业后进入公私机构从事业务工作或进入高一级学校就读。至于总督府师范学校,办学的目的在于培育普通教育之各学校的教员。学习的科目有修身、教育、“国语”(日语)、读书、作文、算术、簿记、地理、历

史、理科、唱歌、体操等,学生年龄为 17 岁以上 20 岁以下,修业时间为 3 年,学生毕业后担任台湾各地之普通学校教员。

在台湾期间,伊泽修二通过所谓“紧要事业”和“永久事业”的实施,向台湾人传授日语,使其成为温驯良顺的日本臣民,并让有意在台湾担任官吏或从事其他公私业务的日本人,掌握台湾方言。他在实施教育时,将普通教育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致力于培养从事普通教育的教员。同时,将台湾人的教育和日本人的教育分开实施。这完全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换句话说,统治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往往必须给予当地某种程度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常较偏重于日语的普及与简易的算术等实务方面。此外,培养殖民地统治所需要的基层官也是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一。”^①

正当伊泽修二在台湾为开拓日据时期教育而奔忙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影响他施展抱负的事情。先是台湾总督府要削减教育经费,接着决定将学务部缩小为学务课,随后又停止了伊泽修二正在进行的有关适用于台湾的特殊教科书及参考书的编纂工作。儿玉源太郎任总督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一次会议上说,谈论教育“只要讨论如何去普及国(日)语就够了……对于智育开发,我们必须防止陷入荷兰、印度弊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②这一番言论颇能代表殖民当局在台湾办教育的目的。确实,“在帝国统治下,最优先考虑的是镇压抗日运动,对于岛民教育方针,已是次要的问题了。”^③1897 年 7 月 29 日,伊泽修二辞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的职务返回东京。同年 10 月,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

伊泽修二任职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几乎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实施。“伊泽修二推行日语教育,设立‘国语传习所’,主张来台日本人也应学习闽南语,后因教育经费问题去职,在学务部长任内虽不到 2 年,但却决定了台湾 50 年的教育方向。”^④如何看待伊泽修二在日据教育发端时期的所作所为呢?笔者认为,从以下一些视角展开将有助于我们对此做出客观评判。

伊泽修二之所以能对日据时期教育的发端产生重要影响,在于他从国家教育主义的理念出发,主张在台湾“保存旧有的教育形体”,注入“新的精神”;废除“无用的文字”,加入“有用的学术”。所谓有用学术,是指在以往汉学的教学中,

① 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0 页。

② 吴三连、蔡培火等:《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 1987 年印行,第 36 页。

③ 杨孟哲:《日治时代台湾美术教育》,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 页。

④ 汤志民:《台湾的学校建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32 页。